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9)下



闵采尔与德国农民战争

“德意志民族也有自己的革命传统，在历史上德国也曾出过能和他国最优秀的革命人物相媲美的人才”，他们“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

这些受到恩格斯如此高度赞扬的“革命人物”中的一位就是公元1524~1526德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中的领袖——托马斯·闵采尔。

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 约公元1490~1525)德国哈茨山麓的施托尔堡人。早年曾就读于莱比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系统学习了神学、哲学。会讲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等几门外语，后来以优异成绩获神学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闵采尔最初做了几年中学教师，后来又曾任修道院院长、忏悔神甫等。

1517年10月，德国宗教改革的著名领导人马丁·路德在维登堡万圣教堂的大门上贴出了《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公开要求辩论赎罪券问题。

据罗马教会声称，只要购买赎罪券，就能赦免炼狱里灵魂的一切罪行，甚至能分享大公教会里的全部幸福。

但是，路德却针锋相对地指出：当金币落入钱柜叮当作响时，增加的只是贪婪爱财的欲望。

路德的“论纲”一经贴出，立刻在全德引起强烈反响，农民、平民、市民、骑士，以至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卷入到这一运动中来。当时正在不伦瑞克的马蒂尼中学任教的托马斯·闵采尔也深深地被路德的精辟见解所折服。不久，闵采尔便加入到路德宗教改革派的行列，并成为路德的一个得力助手。他曾受路德之命前去维登堡附近的尤特博格进行反对教皇党徒的斗争。1520年4月，他又经路德介绍前去茨维考担任那里的第一任新教牧师，继续与路德合作反对方济各会。闵采尔在革命初期，在思想上与路德是一致的，他充满崇敬地称路德是“上帝之友的典范和灯塔”。

然而，分歧终于出现了。

宗教改革后期的路德，由“在开始自己一生活活动时候是人民的一分子”到“完全投靠人民的压迫者，为他们服务了。”

与之相反，闵采尔的思想却愈来愈激进，他攻击教会“以他们冗长的祈祷吞没寡妇的家产，守候在临终的人那里不是为了虔诚，而是为了贪得无厌的私欲。”

路德对闵采尔的这些火药味十足的攻击非常不安，指责他“宣传福音和权利却不顾财产和金钱”，“到处煽风点火”要“在一个早上杀人”。闵采尔则攻击路德因为“他们给你一杯葡萄酒”，就沦为“十足的金钱奴隶”（因为当时路德曾托蔽于萨克森大选侯的瓦特堡中）。双方争执的结果，是分成以圣玛利亚教堂为中心的路德派和以圣卡托琳教堂为中心的闵采尔派。1521年2月16日，茨维考市长曾亲自出面为双方调停，没能成功。4月，茨维考当局决定逮捕闵采尔，闵采尔被迫来到捷克的布拉格。

在与路德派的斗争中，闵采尔的革命思想渐渐形成了。他认识到：“路德是一个蹩脚的改革家，他给软弱的肉体以安慰，过褒信仰，过贬实际”、“反对教皇权，否认赦罪、炼狱、超度和其它弊端，仅仅意味着改革了一半”。路德第一次公开阐明自己的基本宗教、政治观点是在《希拉格宣言》中。

这个宣言发表于1521年11月，路德暂居捷克期间。路德宣称他“要继基督的卓越战士约翰·胡司之后，使响亮的号角发出新的歌声”。（约翰·胡司，捷克爱国者和宗教改革家，生于1369年，后因指责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捷克出售赎罪券，揭露天主教会的腐败和社会不平等，被宗教法庭宣布为“异端”，1415年7月被处以火刑。）

路德对捷克人民发出呼唤：“我考虑的是至高无上的真理，我所咒骂的是不敬上帝的家伙，我来到你们美好的土地上，就是要认请并消灭这些家伙，亲爱的波希米西弟兄们哟，容许我这样做，并且帮助我吧。我保证你们得到莫大的荣誉：革新使基督的教会将在这里创建，并将扩展到全世界”。

闵采尔的革命思想火花已经闪现。闵采尔提出，基督不是神，只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是先知和师表，“根据基督爱的要求，谁也不能高于别人，每人都是自由的，一切财产应当公有”，“每人应按需分配”，“上天以日工资一戈罗什把我雇了来，我正在磨快镰刀，准备收割”。号召人民起来进行暴力革命。

《布拉格宣言》如同一把匕首，投向统治阶级的核心，捷克政府大为恐慌，下令逮捕闵采尔，闵采尔被迫星夜兼程，返回德国。

回国以后，闵采尔奔走于图林根与萨克森地区，继续从事革命宣传活动。他组织起基督教同盟，吸收真正的基督徒入盟。他还亲自主持布道，“穷苦的人们如此向往真理，以致条条大街满是来听讲道的人。”

闵采尔对前来听他布道的人说：“基督曾说，我并未带着和平，而是带着刀剑来的。但是你们要刀剑干什么呢？你们如果要做上帝的仆役，那么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驱走妨碍福音的恶魔。……凡是违背主的启示的人们，都应被消灭掉，而不予任何恩赦，……”。要“杀掉那些不敬上帝的统治者”，“如果诸侯们不消灭这些不敬上帝的人，那么上帝将从他们手里夺去宝剑，因为用剑之权属于全体教徒”。

闵采尔还说，“我们德国是泥足大国，基础不牢，不仅分裂而且伪善。”“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蛇和鳗在一块作恶。教皇和所有的僧侣坏蛋是蛇，而世俗的领主和统治者是鳗”，“如果要做上帝的仆役，那么没有别的任务，就得去驱逐妨碍福音的恶魔。……凡是违背主的启示的人，都必须毫无慈悲地消灭掉”。

同时，闵采尔还散布了许多小册子来宣传革命，著名的如《论德国教会礼仪》、《德国新教弥撒》等。其中《根据路加对福音的证明来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使可怜而不幸的基督教界知道它的迷途》尤其著名，这部封面上印着“带着铁锤的托马斯·闵采尔”的战斗檄文宣告“整个世界必须经受一次大震荡，这是关乎不敬上帝的人垮台而卑贱的人翻身的一场戏”。

闵采尔的革命活动引起他早年奉为“灯塔”的路德的激烈反对。因为“他的活动除导致杀人、暴动和流血外，不能有别的结果”。路德要

求诸侯把“撒旦的邪恶精灵”、“阿尔斯特德的幽灵”闵采尔驱逐出境。这样，闵采尔被迫从阿尔斯特德来到米尔豪森，又从米尔豪森被驱逐到纽伦堡，并在纽伦堡发表了驳斥路德的专著《论据充分的辩护词和对维登堡的过着安逸生活，由于曲解圣经而使不幸的基督徒蒙受了最无耻的诬蔑的无神论者的答复》，书中闵采尔抨击路德“当危急临近时，你不能正确地作出解释。因此你就向诸侯献媚，反而说情况变好了，你就是这样骗取了盛名。……你的处境将如被擒之狐。人民将获得解放”。

闵采尔庄严地向对他施加迫害的诸侯宣布：“在伟大的事业中，虽举世的压力加诸其身，我亦无所畏惧！”

不久，闵采尔离开纽伦堡，并在南士瓦本地区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以他的思想为组织基础，波澜壮阔的德意志农民战争的烈焰，终于在德意志辽阔的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

革命的烈火最先从德意志南部的士瓦本地区点燃。

士瓦本位于德国西南部，西依峰峦起伏的黑森林山，南傍烟波浩淼的博登湖，欧洲的两条著名大河——莱茵河与多瑙河从此发源。本应是一个山清水秀、物产富饶的好地方，然而从1521年起，士瓦本地区天灾人祸不断，先是鼠疫盛行，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接着又是暴风雨不断，洪水泛滥，许多人被淹死。统治这里的诸侯与教会只顾满足自己花天酒地的生活，置百姓疾苦于不顾，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再也无法生活下去，被迫揭竿而起。

1524年6月14日，士瓦本南方阿尔佩部施蒂林根伯爵领地上的农民首先举起义旗，宣布废除徭役、死亡税和其他义务，推举汉斯·米勒为起义军的首领，以参加8月24日的巴托缪节的教堂集会为由，挺进瓦尔茨胡特城。起义军进城之后，与当地的市民联合成立了起义的领导组织——“新教兄弟会”。参加该会的成员有很多是闵采尔的门徒，除了皇帝以外的一切统治者都是他们的斗争对象，他们宣布“破坏所有的城堡寺院，废除封建统治，解救农民于水火之中！”

起义军还制订了军旗，仿照帝国国旗的颜色，以黑、红、黄三色旗作为“兄弟会”的旗帜，以代表统一德国的决心。

9月底，汉斯·米勒率领由1.35万名战士组成起义大军占据了埃瓦廷根，由于当时德国正忙于在海外作战，国内空虚，为赢得战机，费迪南德大公发布命令，允许农民向新成立的、由士瓦本联盟和边区政府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申诉疾苦。起义军识破敌人的阴谋，拒绝服从命令，由宫内大臣汉斯·冯·弗里丁根等人出面与农民军进行谈判，农民军同意停战，弗里丁根答应将由施托卡赫地方法院审理农民的申诉，农民军宣告解散。恩格斯说：“从此时起，那种周密策划的反复行为，那种背信食言，阴谋诡计，就已开始了。贵族和诸侯在整个农民战争期间都是以玩弄这些手法而著称的，而这些手法也是他们对付散漫而难于组织起来的农民的最厉害的武器。”

背信弃义的领主们当然不会答应农民的16条请求。农民军刚一解散，领主便宣布徭役、租税及劳役负担依然照旧，农民们发觉上当了，又开始重新集合起来，到了月初，士瓦本各地一共出现六支农民军，人数达三四万人。

这时闵采尔的宣传旅行，显然对人民党派的形成，对人民党派的要

求能够获得明确的提法，对起义终于在 1525 年 4 月全面爆发，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支强大起义军活跃于莱茵河、多瑙河一带，使统治阶级慌作一团。一些中小城市纷纷归附起义军，同时德军主力仍忙于意大利战争，无力进行镇压。1525 年 2 月 27 日，总务大臣埃克说：“这次我们置农民于不顾，就是说丢到一边，首先去迎击公爵；得手后，再回师痛击农民，定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抱着这个阴险的目的，士瓦本同盟再次欺骗了农民军。他们不但成功地达到了使农民军停战的目的，而且哄骗农民军将于 4 月 12 日再次谈判。

农民军过于轻信了领主们的承诺，3 月中旬，农民军代表多次集会，拟定了“门明根十二条款”，又称“十二条款”。主要内容是要求废除教会加到农民头上的“什一税”；牧师由农民自己选举；废除农奴制；减轻租税、徭役；收回封建领主侵占的草地、森林和牧场，重新发给农民使用。”

然而，就在谈判日期临近的前两天，士瓦本领主的军队在特鲁泽赫斯统率下突然向多瑙河方面的农民军发动了进攻。他们跨过多瑙河，直扑巴尔特林根农民军。由于农民军早已转移到沼泽地后面的密林地帯，特鲁泽赫斯的军队无法发挥武装优势，他们的战马和炮车陷入泥沼中，无法前进，只得作罢。

特鲁泽赫斯当然不会甘心就此罢休，他想起六支农民大军分散于六处，森林中的这支无法突破，还有平原上的农民军，于是 4 月 4 日，特鲁泽赫斯突袭了平原上的农民军，农民军的领袖被捕，农民军的谈判要求被拒绝，多名被俘的农民军也英勇就义。

4 月 11 日和 4 月 12 日，活跃于南方的士瓦本地区的巴尔特林根各支农民军被一一击破。

4 月 13 日，特鲁泽赫斯军队在进攻农民军时，受到农民军前后夹击，于 4 月 15 日狼狈逃去。

此时，双方力量对比明显有利于农民军，农民军不仅在人数上占优势，而且熟悉地形，而特鲁泽赫斯军队已人困马乏，后援不继，本是进攻的好机会，可惜农民军再一次被领主的和谈阴谋给出卖了。

4 月 17 日，特鲁泽赫斯与农民军达成魏国加藤协定。其中规定：各支农民军不得与其他农民军结盟，各村区农民对地主的控诉应由六个中立城市裁决。

协定书签定后，与土地息息相关的农民一哄而散，回乡准备春耕，特鲁泽赫斯大军乘机前赴法兰克尼亚，镇压那里的农民军。

在士瓦本农民起义精神的感召下，从 1525 年 3 月起，在德国中部，以内尔特林根、安斯巴赫、洛腾堡、维尔茨堡等六个地区为中心的法兰克尼亚农民战争也蓬勃兴起。

法兰克尼亚地区的农民军，共有 8000 多战士，3000 多支枪，还拥有几门大炮，是德国农民军中装备最优良的一支，主要领导人有梅茨勒、罗尔巴赫和盖尔。

1525 年 3 月 26 日，巴伦贝格旅店主梅茨勒高举顶端绑着一只鞋的长杆（注：1493 年，德国农民的秘密组织鞋会曾以鞋为旗帜的标志，提出废除捐税、农奴制，取消宗教法庭等要求，后被镇压），号称“基督教

农军”，高唱一首当时流行于起义军中的名为“穷康拉德的战歌”，向杀人如麻的黑尔芬施泰因伯爵的城堡发起冲锋，歌中唱道：

“嗨！我穷康拉德！仍然健壮。
饥饿的山冈，哭泣的河流，
我持锤遍走！
奴隶般生活，何时得解救？
农民和领主，愿同法追穷。
嗨！我穷康拉德！
猛刺吧，长矛！
横扫吧，棍棒！”

我穷康拉德，我就在这里！
在田野，在树丛。
钢盔亮晶晶，盾牌清又净，
“鞋徽”伴英雄！
诸侯并教皇，一对瞎眼睛。
我自设法庭，判领主死刑。
圣经，就是我的命令！
我穷康拉德，我就在这里！
猛刺吧，长矛！
横扫吧，棍棒！
嗨！我穷康拉德！
教皇和贵族，靠战砍根除。
老爷皮鞭抽不住，剁成肉泥向谁诉？
活剥我们的皮，还把妻子辱。
嗨！我穷康拉德，
猛刺吧，长矛！
横扫吧，棍棒！”

梅茨勒起义军又联合了罗尔巴赫起义军和声名显赫、作战勇猛的盖尔黑军，三支大军会合以后，组成“奥登瓦尔德—内卡河谷华美军”，兵力增至 8000 人，顿时军威大振，起义军像汹涌的潮水一般涌进城内，双手沾满了起义军鲜血的黑尔芬施泰因吓得逃进教堂躲避起来，仍被起义军抓获。

黑尔芬施泰深知自己罪大恶极，起义军不会轻易饶过自己，就主动提出“只要你们饶我一命，我愿出三万古尔敦！”

“三万古尔敦？”起义军中一个战士愤怒地说“血债要用血来还！你杀死我们那么多兄弟，即使两吨黄金也赎不回你的狗命！”

农民军在一个大广场上设置了法庭，公开审判黑格芬施泰国等 14 个恶贯满盈的大封建主，广场上旗帜飘扬，锣鼓喧天，成千上万的起义士兵和群众聚集到广场上，参加公审。最后起义军一致同意没收这些人的全部财产，处死 14 人。

于是，那条曾经夺去无数条起义战士生命的鞭子，终于抽向了那当

初执刑的人，这些罪大恶极的封建领主在起义战士的皮鞭下、梭镖中了结了他们罪恶的一生。

5月9日至12日，法兰克尼亚地区各派农民军在海尔布朗集会，起草了海尔布朗纲领，提出14条改革方案。

纲领内容涉及如下几个方面：没收僧侣财产；统一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除皇帝的赋税外，废除一切关税、杂税和赋税；统一度量衡与币制；政教分离，僧侣不得担任官职、顾问和出席帝国议会等。

然而，海尔布朗城内混入起义军的贵族出卖了起义军，他们打开城门，使特鲁泽赫斯与路德维希的反动军队顺利进入城内，起义军被全部剿杀，法兰克尼亚地区大道两旁的树上，吊起一具具起义军的尸首。

到1525年7月，法兰克尼亚地区的中部农民战争结束了。

1525年初，闵采尔回到缪尔豪森，号召人们参加基督教同盟，抨击贵族与诸侯的黑暗腐朽。

1525年3月17日，缪尔豪森起义军解散了旧的市议会，成立“永久市政会”，闵采尔以新教牧师的身份经常出席市议会。提出废除封建特权，社会财产公有，公民都要劳动等，受到各阶层人民普遍欢迎。起义军的影响迅速波及到缪尔豪森城四周的地区，革命烈焰一时高涨。在瓦特堡、富尔达、施瓦茨堡、茨维考等地区，成千上万的农民、矿工组织起来，攻城掠地，捣毁庄园，焚毁教堂，各地诸侯闻风丧胆，被迫接受了农民的一些要求。

闵采尔的革命活动更加积极了，他号召人们：“我们决不能再沉睡了。……前进，前进，前进！烈火正旺，让你们的宝剑染上热血！要在战神的铁砧上把恶人打烂，把他们的碉楼掀翻！”

在闵采尔的鼓动和宣传下，群众奔赴图林根与萨克森的矿山、农村和工场，闵采尔亲率一支大军驻扎在弗兰肯森城内，训练军队，铸造兵器，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5月15日，黑森伯爵等统率8000人大军，逼近弗兰肯森城，提出与起义军休战3小时和谈，又提出只要交出闵采尔，就可免于对其他人的追究。闵采尔向起义官兵揭露了敌人惯用的假和谈阴谋，果然，休战时间还未过去，诸侯的炮口就对准弗兰肯森猛轰。

闵采尔率众拼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5月25日缪尔豪森落入敌手，闵采尔也不幸被捕，德意志农民战争基本结束了。对敌人的严刑逼供，他坚贞不屈，据理力争，表现了一个革命领袖的大无畏气概，气极败坏的缪尔豪森统治者终于杀害了年仅35岁的闵采尔。闵采尔虽然牺牲了，但他短暂的一生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永久的英名！

马可尼发明无线电

1896年12月12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在伦敦科技大厅里，已经座无虚席，英国通信技术权威普利斯在结束演讲后，走到人群中，拉出一个英俊的年青人，然后给大家作介绍。这个年青人给大家进行了无线电通讯实验的精彩表演，博得了科技大厅的人们雷鸣般的掌声，获得了人们的热烈欢迎。他就是年青的无线电发明者马可尼。

普利斯先生等他表演完，打着优雅的手势在大厅当众宣布：“女士们，先生们，马可尼先生的无线电将改写人类通讯的历史，它是通讯史上的一场伟大的革命。”普利斯先生的话说得真对。

1888年，德国青年科学家赫兹用金色大字书写了近代科技史上的篇章——打开了电磁波的大门。赫兹的发现公布后，世界科技界立刻轰动起来，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都认为这一发现不但在理论上意义深远，而且在实用上也有重要价值，工程技术人员更是被赫兹波给吸引住了。遗憾的是，上帝不仅把智慧赐予了赫兹，同时也给了他灾难。1894年，年仅36岁的科学家不幸在外科手术中去世。他未能看到自己的发现给予世界的伟大意义，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他永垂不朽的功绩。

赫兹的天才发现给无线电发明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探索赫兹波的应用成了热门科研课题。法国物理学家布冉利首开记录，他在1890年的试验中，无意发现赫兹波使一个玻璃管里的铁屑的电阻减少了。这个偶然的发现触发了他的灵感，他根据“铁屑效应”的原理改进了赫兹的接收器，布冉利对赫兹的接收器改造以后，制成了金属屑检波器。他把装有细铁屑的玻璃管两头都接上导线和电池，在没有电磁波的情况下，玻璃管里的铁屑是松散的，不能导电；当电磁波辐射到接收器上时，玻璃管里的铁屑被磁化而粘在一起，这样就能导电，比较好地检测电磁波的作用。同年，布冉利使用金属屑检波器，使电磁波的探测距离增大到140米。

赫兹的朋友、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洛奇教授对布冉利的发明进行了改进。洛奇专门设计了一个机构，能够自动敲击玻璃管，使金属屑及时恢复原状。他的检波器在早期的无线电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当洛奇在英格兰的实验室工作时，远在地球另一边的新西兰岛上，一个名叫卢瑟福的大学生也在进行这项工作——改善布冉利的检波器。当时才23岁的卢瑟福是坎伯雷学院四年级的学生，其时他正在准备理科学士的学位考试，设备简陋的坎伯雷学院执教严格，要求一定要写出有独到见解的论文方能通过考试。年青的科学家选中了一个和他一样年青热情的课题——《赫兹波的研究》。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在破旧不堪的地下室里发明了别具一格的磁性检波器，这是一个中心放着一束磁化过的细钢针的线圈，当电磁波到达线圈时，线圈的感应作用可以使钢针暂时失去磁性，这样就达到了检测的目的。这个检测器比起其先辈来说，灵敏度要高得多。1894年，《新西兰协会学报》刊登了卢瑟福的研究论文《用高频放电法使铁磁化》，这篇论文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就在这一年，卢瑟福还成功地在一座18米高的工棚里进行了电磁波收发表演，这一事被称作“越过新西兰上空的第一部无线电报”。

1893年，纽约的中年电学家台思拉发表了电磁波接收的调谐原理，

并发明、发展了无线电遥控技术。马可尼的发明是在布冉利、洛奇、卢瑟福和台思拉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

马可尼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波伦亚城，他的父亲是个农场主，母亲是个爱尔兰贵族的后裔，他的身上流着英国贵族的血液。他勤奋好学，热爱阅读，尤其喜欢阅读物理学方面的书籍。他 16 岁时，一个无线电专家李奇老师送给他一本电学杂志，并给予他许多帮助。李奇老师见年青的学生是个可造之才，就热心地栽培他，并指导他在学校作一些电磁实验。通过一年的刻苦钻研，他成了一名无线电小专家，求知的欲望使他不囿于前辈的见解。他弄清了前辈们的优点和缺点后，决定集各家之长，成自家之利。他在父亲庄园的楼上建立了实验室，潜心研究，但总是失败。他父亲笑他是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执拗的马可尼毫不气馁，在母亲的袒护下，继续他的活动。1894 年，弱冠之年的马可尼迎来了他的初步胜利。他的母亲应邀作了首次客人，参观了儿子的精采表演：马可尼在一张小长桌上放着一台简陋的收发报装置，马可尼按下电钮，就从楼下客厅里传来一阵铃声。支持儿子的母亲看见儿子的研究成果，乐不可支，晚上丈夫回家后拉着去看儿子的“汇报表演”，父亲默许了儿子的研究活动。

1895 年的夏天，20 岁的马可尼非常成功的进行了一次电磁波传递信号实验，实验是在他父亲的花园里进行的，他用的发射装置是恩师李奇改进的火花式发射机，接收机带着一根天线，其中金属检波器是大胡子洛奇的杰作，另外还有电铃和电池。

同年秋天，马可尼把电磁波的传送距离扩大到 2.7 公里。他把火花式发射机放在村边的小山顶上，天线高挂在一棵大树上，在小山顶上发报，他在楼上接收，实验成功极了。马可尼渴望进一步进行实验，由于资金短缺，向意大利政府求援未果，他离开了祖国。

1896 年初夏，他来到了英国。英国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国家，然而正是这个陌生的地方向他伸出了援助的手。刚到伦敦不久，他的发明就获得了英国政府的专利，并且专利局的官员还介绍他去找普利斯博士。

作为英国电信界的领袖，普利斯早就在研究感应无线电报，马可尼刚到英国时，他正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试验，但都失败了。10 多年的艰辛，换来的是徒劳无功，普利斯不免有些惆怅和遗憾。正在这时，他从英国《电气技师》上看到马可尼申请专利的简报，发现马可尼用电磁振荡的方法发明了无线电报，他感到无比惊奇和欣喜，急于想见到这个名不经传的年轻人。一天，普利斯如愿以偿，马可尼前来登门拜访。普利斯高兴地接待了神交已久的发明家，并进行了热烈的交谈。马可尼谦逊地拿出他的收发报机请普利斯过目并恭敬地请他指点。普利斯非常欣赏年轻人的才干和品质，请他留在邮电总局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不久，马可尼在普利斯的帮助下，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进行了无线电信号实地收发实验。这一次电磁波的传递距离达到了 8 公里。

1896 年 12 月 12 日，德高望重的普利斯把马可尼介绍给大家，就像本文开头介绍的一样。从此，马可尼登上了英格兰的社会舞台，整个大不列颠都知道马可尼和他的无线电了。

1897 年春天，马可尼在英国西海岸南端的布里斯托尔海湾紧张地进

行跨海通信试验。理论和实验都行得通，但究竟在实际使用中能否具有生命力将由这次实验来进行检验。普利斯为了这次实验能够成功，特地把自己的助手乔治·肯普调来协助马可尼。

马可尼将发射机装在拉渥洛克岸上的小屋里，屋外竖起一根很高的杆子，上面架设了由金属圆筒制成的天线。接收机开始放在海湾里的佛勒霍姆小岛上，接收天线也是架在高杆上的金属圆筒，跟对岸的发射天线遥遥相对，收发两地之间相距 4.8 公里，通信效果良好。

一个星期后，马可尼和肯普把接收机移到海岸的布瑞当，收发距离增大到 14.5 公里，聪明的发明家用两只覆盖着锡箔的风筝作为收发天线，风筝可以升到好几十米高，比圆筒天线高得多。5 月 18 日，通信试验获得了很大成功，无线电信号第一次传过了布里斯托尔海湾。普利斯在试验结束后拍着马可尼的肩膀表示祝贺，马可尼却盛赞肯普的干练得力。宽厚、谦逊的普利斯为了帮助年青的发明家，当场告诉他可以把肯普留下，马可尼大喜过望，从此，肯普成了他终身的助手，为他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次跨越海湾的通信在无线电史上具有很大的意义，它是人类第一次不用导线而把信号传过了海湾。

同年，马可尼还在怀特岛的艾伦湾建立了一座电台，取名叫尼特无线电台。在这个小岛上，马可尼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通信实验。

1899 年夏天，马可尼成功地实现了英法海峡——多佛尔海峡两岸的无线电报联络，把通信距离扩大到 45 公里。

同年 9 月和 10 月，马可尼被邀请访问美国，他用随船的无线电装置报导了美国在领海里举行的国际快艇比赛实况。当访问结束，马可尼离开纽约前，通过海底电缆发电报给伦敦的实验室，告之他乘坐的“圣保罗”号预定在星期三上午 10 点到 11 点之间到达，星期二上午就到尼特电台作好准备，实验室主持人弗伦德还派了一名助手在机房值夜班。

第二天，弗伦德很早就起来巡视整个通信站，洋面上无一丝帆影。到了中午时分，邮船预定到达的时间早已过去了，但依然没有任何消息，弗伦德和他的助手们开始焦急起来，担心发生什么事。

直到下午 4 点 45 分，接收机上的电铃突然响了起来。

“你是圣保罗号吗？”尼特站发出电报问对方。

“是的”。对方回答。

“你在哪里？”

“66 英里以外！”

马可尼的电报终于驱散了大家的忧虑，尼特站顿时洋溢着欢乐的气氛。马可尼第一次成功地把无线电通信距离增大到 106 公里，无线电信号首次突破了 100 公里大关。这一天是 1899 年 11 月 15 日。

突破了无线电通信百公里大关的马可尼没有停止不前，他把目光投向了辽阔的大西洋，渴望在欧洲和美洲之间建立起无线电通信。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当时很多内行人都认为很难实现，这一见解并非毫无理由。第一，无线电的收发装置在当时还处于原始阶段，发射机还停留在火花式发射机的水平上，电振荡是衰弱的，也没有功率放大输出；接收机很简单，检波器是老式的金属屑检测器，没有电子管放大电路，也没有现代接收机最基本的超外差接收方式。第二，英国和北美相隔太远，地球的曲面很可能妨碍通信的实现，一般人都认为电磁

波只能像光波一样传播，不能绕过地球曲面传播。

马可尼则根据 1899 年在大西洋上进行通信试验得到的经验，认为电磁波有可能“绕过”地球曲面传到大西洋彼岸，他决心要认真去探索。

为了实现这一越过大西洋的宏伟计划，马可尼作了大量准备工作。1900 年，他获得了无线电史上有名的调谐电路的专利。这种电路相当于现代接收机的输入调谐回路。

同年 10 月，马可尼在普尔杜建立第一座大功率发射台，采用了 10 千瓦的音响火花式电报发射机，这是当时世界上功率最大的发射机，同发射机相配合的天线很复杂。最初架设的是一种庞大的垂直天线阵，是用 2000 根 60 米高的金属杆围成的一个大圆柱网。网的直径达 45 米，周围还有很多固定的缆绳。可是因为天线太高，支撑困难，没多久就被大风给刮倒了。受挫的马可尼没有气馁，他改变方案，新架设的天线用很多根垂直天线排成扇形，结构牢固，抗风性强，可以一直使用下去。初次试验，通信距离达 322 公里。

1901 年 11 月 26 日，马可尼、肯普和另一位助手佩基乘“撒丁”号轮船，从英国西部港口利物浦起航，向纽芬兰驶去。他望着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思绪万千，想起当初离意大利去英国的情景，而如今自己将要踏着前人的足迹去开拓新的领域，完成人类史上的又一创举。

12 月 6 日，轮船横渡大西洋，到达纽芬兰的圣约翰斯港，马可尼和两名助手登陆上岸。第二天，马可尼拜访了纽芬兰官员，好客的主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答应和他密切合作，为他的试验提供一切方便。

马可尼和他的助手仅用了三天时间，便完成了实验的全部准备工作。

12 月 9 日，正当他们工作之时，天气突然刮起了大风，气球被吹得跳起了摇摆舞，最后腾空而起，消失在天空之中。

10 日风还在继续刮，马可尼不仅想起了四年前，他曾用风筝在布里斯托尔海湾成功地进行了试验，他就决定改用风筝做天线。使天线被控制在 220 米左右的高空。

这是一个阴冷的天气，山脚下的悬崖在海水的拍击下发出雷鸣般的吼声，面对波涛汹涌的大西洋，英国远在 3000 多公里的另一半地球上，圣约翰斯港静静地躺在山边，沐浴在薄雾中。

在这个划时代的日子，马可尼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关键时刻终于到了，我为它作了六年艰巨的准备工作，各种责难从来没有使我动摇过，我就要检验我的理论是正确的，证明我已经获得的 300 多项专利的价值，为了进行这次试验和在普尔杜建造大功率无线电台花费了我数万英镑，这笔钱是不会白花的。”为了更有把握，马可尼决定不用莫尔斯电码记录仪作终端，而改用电话机来直接收听金属屑检波器的输出信号，因为人的听觉比记录仪要灵敏得多。

1901 年 12 月 12 日，预定的通信时间到了，大家屏息静气地等待着，大约中午 12 点半，电报键突然发出了“的答”声，信息来了！马可尼立刻抓起听筒，紧张地听着，三个微小而清晰的“的答”声在马可尼耳边响起，啊，千真万确，这是从大西洋彼岸传来的信号，飞越了 3000 多公里！

马可尼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把话筒递给旁边的肯普说：“伙

计，你听听看有些什么。”肯普接过话筒，贴在耳朵上，几秒钟过去了，他兴奋地喊叫起来：“信号，三点短码！”

在莫尔斯电码中，三点短码代表“S”，这个信息是预先约定的。现在，从普尔杜发来的“S”字母信号，越过茫茫大西洋，被他们清晰地收到了！试验人员欣喜若狂。马可尼凝视着无边的大西洋，眼里闪现着胜利的光芒，他确信，不用电缆进行横越大西洋通信的时代已经不远了。晚上，试验成功的喜讯由圣约翰斯城邮局用有线电报传遍了全球。

1897年7月，马可尼在伦敦成立了无线电报通信公司，后改为马可尼无线电公司。

1898年7月，马可尼的无线电报装置正式投入商业使用，替爱尔兰首都柏林《每日快报》报导快艇的比赛实况，马可尼把电台装在一台租来的轮船上，随时把比赛实况拍发给岸上的接收台，然后通过电话线直接告诉给《每日快报》编辑部，当天晚上，比赛结果就见报了。

1899年7月，马可尼的无线电通过装置第一次在英国海岸演习中使用，具有远见卓识的英国皇家海军没有忽视这一尚处于雏形的“小玩艺儿”，把它们装在三艘军舰上，由马可尼及助手分别操作，演习中无线电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演习结束后，皇家海军与马可尼签订合同，要他第二年给海军的28艘军船和四个陆上通信站装置无线电台，这是马可尼公司的第一个大宗合同。终于，马可尼公司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S”信号胜利越过茫茫大西洋，这在无线电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它表明，只要建立起永久性的电台，洲际无线电通信就指日可待了，马可尼对此深信不疑。

为了向全世界表明这一点，马可尼又作了一次试验，确实的电报内容越过2500公里的大洋，传送到目的地，马可尼的预言变成了事实。

加拿大政府对这次成功的实验非常满意，特地拨款1.6万英镑，让马可尼在格拉斯湾建立一个大功率的发射台。1902年12月的一个风高月明的夜晚，相隔3000多公里的普尔杜台和格拉斯湾台开始试验通讯。这是英国和加拿大之间第一次正式进行的洲际无线电通信。结果英国接收加拿大的信号非常清晰，而加拿大接收英国的则要差一点，这表明普尔杜台的发射功率还不够大，马可尼公司就拨款予以改装，嗣后两台之间的正式通信完全成功。第一份从加拿大拍往英国的正式电报是马可尼发给英国和意大利国王的，这表明了马可尼的胸襟，他忘不了生于斯养于斯的祖国，他更忘不了支持他事业的第二祖国英格兰。

1909年1月，在大西洋上发生了“共和国”号同“佛罗里达”号相撞的恶性海上事故。幸亏船上安装了无线电台，及时地发出呼救，才使所有的乘客和船员幸免于难。无线电在海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912年4月10日，在数千人的欢呼声中，有“人类进步象征”之雅号的英国豪华邮轮“铁达尼”号在南安普敦港下水出发，开始了它横渡大西洋的首次航行。在这艘长达267米的巨轮上载着1348名旅客和864个船员，开往大洋彼岸的纽约。

“铁达尼”号航行在烟波浩渺的大西洋上，船舱里不时传出舞会的音乐声和人们的欢声笑语，静谧祥和之情洋溢在轮船的每一个角落。欢乐的旅客那里知道，死神正向他们走近。当“铁达尼”号驶进纽芬兰南边的洋面时，冰山险情出现，航行在前面的“加利福利亚”号发现险情，

并向“铁达尼”号发出冰情警报，遗憾的是恰好此时“铁达尼”正在拍发一份私人电报而没有收到。深夜时，当“铁达尼”号发现险情时已来不及了，轮船被撞开了一条长达百米的裂口，冰冷的海水像猛兽一样扑进船体，“永不沉没的水上之城”此时也躲不开灭顶之灾了，临危不乱的史密斯船长镇定自若地命令报务员发出求救信号。

随着按动的电键，呼救信号飞向各个海域的船只，第一个回电的是艘德国船，接着从纽约开出的“卡帕夏”号也收到了信号。但是都相隔数十海里，远水解不了近渴，拍发过冰情警报的“加利福尼亚”号此时就停在大约 10 海里外的地方，但由于报务员擅离职守，导致了 1000 余人葬身鱼腹的命运。

事件表明，无线电在航海事业中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为此，海上生命安全国际会议规定：5000 吨以上的轮船必须安装无线电收发报机，24 小时必须有人值班。

现在，无线电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应用在各行各业，卫星、航海、气象、军事都广泛应用无线电，马可尼在无线电技术上的伟大贡献改变了电讯的历史，为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开拓了一条金光大道。

伽利略开辟近代自然科学新时代

伽利莱·伽利略（1564 - 164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对他的评价西方世界熟知的一句名言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伽利略发现了新宇宙”。

欧洲近代自然科学，是从伽利略开始的。考察这位伟大人物的一生，后人会从中吸取到丰富的营养，并深为他的精神所折服。

伽利略，一个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科学卫士。

伽利略从小便显示了极高的天赋。他聪颖过人，勤勉好学，对拉丁文、希腊文、哲学、音乐、图画等学科都有浓厚的兴趣，他的接受力之强也曾使身为数学家和音乐师的父亲大吃一惊。

但是，小伽利略感兴趣的还不止这些。从小，他就是一个“天空音乐家”。他喜欢一个人默默地、专注地看着星空，那闪烁的群星在调皮地向他眨眼，“星星的背后有什么？”“星星是钻石吗，为什么会发光？”爱好音乐的伽利略沉浸在另一个神奇的世界里，那是想象中的星星运转时的奏鸣曲。

小伽利略还是个小机械师。他每天的游戏便是不停地制作机械玩具。他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世界，不断地制作出象车、风车、船之类的模型。

幼年时期形成的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的良好品质使他一生都受益匪浅。

由于伽利略不肯盲从别人的观点，只相信自己的观察和实验，往往会冒出一些别人难以理解的“疯”念头。

伽利略生活的时代，正是近代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转型期，教会控制文化的“黑暗时代”还没有过去，宗教裁判所就是对敢于违背教会宗旨的人的审判镇压机构。即使在文明的摇篮——学校里，教师们也奉守教条的先哲规矩，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就用一句大学者亚里士多德的话来搪塞“导师已经指示过了。”

但是，伽利略从不轻信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他的脑海中时时在思考着。

一天，伽利略正在教堂里做祈祷，寂静中传来挂灯链条摆动的嘀嗒声，爱动脑筋的伽利略从那有节奏的韵律中，发现挂灯每往返摆动一次的时间似乎一样长！

于是，他出人意料地跳起身来，跑回家去，他要通过实验来验证自己的这一发现。

他兴冲冲地找到他的教父穆契柯·铁达迪帮助他做这个实验。“过一会儿，请您帮我数一下绳索的摆动次数，”伽利略说。

“又是一桩伽利略的疯念头，”教父嘟哝着，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他不知道这个伽利略又在捣什么鬼。

一会儿功夫，伽利略就做好了实验的准备工作。他把挂有同样重量铅块的两根等长的绳索分别悬挂在两根厅柱上，他将两个铅摆，分别拉到距垂直线四掌宽和两掌宽的位置上，然后同时撒手。

“开始！”伽利略喊道。

“100次”，“100次”，“我成功了！”伽利略兴奋地喊道。

就这样，从比萨教堂悬挂的一盏油灯的来回摆动中，医科大学生伽利略发现了摆锤的等时性定律，并被后人广泛应用于时钟计时、计数脉搏、计算日食、推算星辰等运动方面。

伽利略很快对数学产生兴趣。那是在他听了宫廷教师里奇的一番谈话之后，他立即被那深奥揭密的欧几里德、阿基米德所陶醉——“数理科学是大自然的语言”。于是，他在就读的比萨大学里一面学医，一面专心致志地钻研数学，藏在他的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教科书下面的是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的著作。校方认为他是一个“玩弄无用的数学的神经病患者”，拒不发给他医学的毕业文凭。

1585年，伽利略被迫离开比萨大学，回到佛罗伦萨。他继续孜孜不倦地埋身于数学王国中，对他所热爱的事业倾注了满腔热血。1586年，他发表了《比重秤》，这部著作使他在数学界一举成名，被称为“当代的亚里士多德”。

1589年，伽利略在比萨大学谋到了教授的职位，回比萨大学执教。

校方很快发现，这个年轻的数学教授“恶习难改”。他公开在课堂上讲，比背诵圣哲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学说更重要的是“学习大自然这本宝书”，亚里士多德也会犯错误，没有经过亲身检验，不能轻易相信。而且，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成天忙于实验，用“小孩子的玩具”——绳索锡块、杠杆图片来“研究宇宙奥秘”。

更让校方大吃一惊的是，1590年，他居然提交了一篇论重力的长篇论文。他公然指责，亚里士多德认为从同一高度掷下两个物体，重的物体先落地，轻的物体后落地，是错误的，应该是同时落地；而且，他从实验中发现自由下落的物体所经过的距离与其耗费的时间的平方成正比的规律。这样，伽利略不仅从实践上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而且又有理论为依据。

然而，在以亚里士多德派为主的比萨大学里，伽利略却遭到了群起攻之。

伽利略相信，事实胜于雄辩，他将让公众通过自己的眼睛来证实。

这一天，比萨斜塔前聚集了許多人，有市民，也有教授和学生，这个“狂妄”的数学教授今天可要出丑了，一些反对他的人幸灾乐祸地想着。

然而，他们很快就失望了。伽利略从同一高度同时掷下的一个十磅、一个一磅重的铅球，它们同时从高空坠地！

尽管如此，那些顽固的教授们还是不肯相信伽利略的学说，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怎么会错？直到后来，科学家塞特尔的实验才最终结束了对伽利略的实验多半是虚妄的指责。

比萨塔上的实验，标志着伽利略向圣哲亚里士多德学说挑战的开始。

与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方法相反，伽利略更重于用实验来检验。他承认感觉对思维有启迪作用，但他更相信千百次实验得出的结论更接近真理。他的实验分如下四个步骤进行：实验性观察，作业假设，数式化或理论性演绎、操作。这种方法对他后代的科学家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伽利略的所作所为终于使校方决定驱逐这位对“圣哲”出言不逊的狂妄教授，年轻的伽利略怀着—颗怅惘的心离开了比萨大学。

不久，当时欧洲著名的帕多瓦大学发来了聘书。由于当时威尼斯包括帕多瓦已被教廷摒弃，所以帕多瓦大学的学术气氛比较自由，教授们也很容易接受新观点，这无疑给伽利略提供了一块进行学术研究的乐土。他一生中的许多重大成就都是从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受益的。

伽利略为后人熟知的重大贡献是在天文学领域。

伽利略从小就对神秘的太空充满向往，长大后，他成了哥白尼的崇拜者。根本不相信教会的“地心说”。1600年2月，当哥白尼的信使、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布鲁诺因为坚持“日心说”被教会关押十年之后，在罗马鲜花广场被活活烧死。消息传来，他忍住悲愤，决心一定要找到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哥白尼学说的正确，为布鲁诺伸冤。

但是，浩瀚无际的宇宙始终不肯让人类看清楚，千百年来，人们只能凭着肉眼来观察日升日落，月盈月亏。伽利略苦苦思索着，如何制作一个仪器来观测太空？

灵感的火花终于爆发了，当他听说一个眼镜商人在制造镜片时，偶然发现一块凸镜片与一块凹镜片合在一起时，便出现了物体放大的图象，他欣喜若狂，许久以来一直困扰着他的一个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

他迫不及待地找来各种类型的镜片，研究它们的曲率，将各种不同镜片组合比较，并用数学公式来测量出不同曲率及组合所引起的视觉上的效果。一个晚上的时间，世界上第一架可以将物体放大3倍的筒式望远镜诞生了。随后，经过不断试验改进，终于在1609年制成了一架可以放大32倍的望远镜。于是人们惊奇地发现，“正向这里驰来的帆船……是那么遥远，以至要等两个小时之后他们才能用肉眼看到”，“遥远的星宿如在眼前”。

利用这个望远镜，伽利略发现了人类从未见到过的太空景象。

伽利略惊奇地发现，皎洁明亮的月球上居然凹凸不平，既不平滑，也不纯洁，而是覆盖着高山峡谷，还有火山口的裂痕；木星有四颗卫星，银河由无数星体组成；土星是有光环的……

伽利略将自己的发现，通过1610年出版的《星宿的信使》公布于世，从而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天体完美无缺”的理论。然而在不朽声名建树的同时，也蕴含着悲剧的上演。

受佛罗伦萨及比萨大公科西摩二世之邀，伽利略来到佛罗伦萨，担任宫廷数学家，继续观察太空。他确定了金星的位置，发现了太阳黑子。1613年，他发表了《论太阳黑子的信札》，证实了哥白尼的学说，认为太阳呆在原地自转，地球绕太阳旋转。

伽利略的一举一动早已引起宗教裁判所的关注，亚里士多德派与教会勾结起来，联合向伽利略发起了进攻。

1616年3月，伽利略被宗教裁判所宣召，“劝”他“放弃他的关于地球、太阳和星宿的异端邪说”、“如果违犯，就得受严厉制裁”，但保留了将哥白尼学说作“数学假设”的研究权，其著作也被列为禁书。

1623年，伽利略的朋友马太·巴尔贝里尼当选为罗马教皇，伽利略不知是出于对朋友的信任，还是难捺心中的“激情”，发表了著名的《关于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两个体系指的是教会支持的托勒密“地心说”，和哥白尼的“日心说”，文中他虚构了三个人物：萨尔维亚蒂、辛普里邱和沙克列多。前两者分别赞成哥白尼、托勒密的学说，充当了他们的

代言人，为他们的学说辩护。而沙克列多则充当了评判的角色。

这部著作向传统的旧观念发起了全面的攻击，有力地捍卫了哥白尼的学说，一个全新的宇宙呈现在世人面前。其中蕴藏的丰富天文学物理学理论，即便今天读来，也堪称一绝。

然而，一直对伽利略虎视眈眈的教会再也坐不住了，他们诽谤伽利略是借沙克列多讽刺教皇愚昧无知，以此激怒教皇。

1633年6月，伽利略接到了宗教裁判所的传讯，当时，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正“生病在床，他可能到不了罗马，就到另一世界去了”，但是罗马方面却下令，“只要他能勉强成行，就把他锁上铁链，押到罗马来！”

四个多月的严刑折磨之后，罗马教廷最后给伽利略定罪：“反对圣经的真正精神和权威的各种原理”、“引起神圣的信仰遭到毁灭的愈益扩大的混乱和毒害”。伽利略被迫在永不再宣传异端邪说的誓约上签了名。然而，当他转身离去时，仍忍不住固执地重复说，“可是，无论如何，地球仍在运转啊。”

伽利略在天文学上的巨大成就，使科学与神学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一胜利开辟了自然科学向前迈进的新时代，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兴起。

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对话》一书也被禁止出售，然而，伽利略的研究工作并未就此止步。

1638年，伽利略的《新科学对话》在莱登公开发表，书中认为光速是有限的，可以测量，另外书中还涉及声学问题、阻力问题等。更重要的是，他完整地提出了惯性定律，书中关于力学的伟大发现，为近代物理力学的发展揭开了序幕。后来，牛顿就是踩着这位巨人的肩膀，提出著名的运动三定律的。

完成《新科学对话》之后，他对力学领域继续探索，1642年1月8日临终时，他怀抱着《运动的法则》这本被认为是他一生最伟大的著作，以模糊不清的声音说：“我认为这是我一切著作中最有价值的，因为它是我极端痛苦的果实。”

让我们对这位伟人的一生成就进行概要总结：

他发明了温度计，改良了望远镜。

他成功的进行了关于磁电、引力、运动等领域的科学实验。

他发表了《星宿的信使》、《论太阳黑子的信札》、《论彗星的本质》、《关于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新科学对话》、《运动的法则》等。

伽利略，一个当为世人铭记的人物，他带来了自然科学的新时代。

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英国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支重要支流。如果说大英帝国的辉煌是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那么英国 17 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则是点燃这支火炬的火种，它不仅是英国历史上和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而且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革命推动了历史前进，开辟了人类发展的新时代，从而把社会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17 世纪中叶的英国的革命，是结束英国封建制度统治、奠定资本主义制度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

英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从此，马斯顿荒原的刀光剑影，纳西北山地的激烈争夺战，爱尔兰远征的铁血政策，威廉国王的武装登陆，《权利法案》的出笼，这一切都构成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宏伟蓝图。在这以后，大不列颠王国实力逐渐强大，战荷兰，夺取美国纽约和东南亚辽阔国土，与法国长期争夺欧洲霸主，占领加拿大和印度，19 世纪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而使这块古老的土地遭受洋人的践踏。英国皇家舰队在三大洋畅通无阻，刀兵所指，无不臣服，建立了强大的日不落大帝国。到处树立了世界霸权。

17 世纪的英国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不安宁的社会孕育着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浪潮。这时候，英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新民族已经不再软弱，他们已经日益变得强大起来，他们的各个方面都在其封建社会母体中日益发展、成熟，而且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了英国的历史舞台。就在此时，统治着英国的是斯图亚特王朝，王朝的历代国王都是虔诚的国教徒，崇拜“君权神授”，企图在英国建立强大的专制王权。这时羽毛渐丰的资产阶级是不能容忍建立专制王权的。随着经济力量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对权力的欲望不断高涨，他们的势力在国会（主要是下院）中得到了不断加强，并通过它来抨击王权，提出他们的政治要求。国会是中世纪时建立起来的，它代表了英国光荣的政治传统：国会拥有批准赋税的权力，没有国会同意，国王不得随意征税，国王必须尊重国会，国王受国会的约束，违反这点被认为是违法，资产阶级正是利用这一点使国会成为反对专制王权的堡垒。

詹姆斯一世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代国王，他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资产阶级极为反感，他们挥舞手中唯一锋利的宝剑——国会，同国王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使得国王多次解散国会。因此，自从詹姆斯一世执政以来，王权同国会的斗争一直左右着英格兰社会。

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的最后两年里，詹姆斯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巧妙地利用了查理二世由于顺应逆境，等待时机和奉行屈辱的外交政策为斯图亚特王朝取得了胜利。对詹姆斯来说，他的继位似乎振兴了他所维护的衰败事业。他认为，能够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国王的唯一办法，就是像路易十四在欧洲大陆那样，建立一支训练有素、装备优良和忠于王室的海、陆军力量，这支力量像一把钥匙，也许能打开任何一座大门。一旦国王手中有了沉重、坚韧而锋利的宝剑，那么喋喋不休的国会、有政治倾向的傲慢贵族、取得胜利的主教制度、大肆叫嚣的辉格党和气急败坏的清教徒都会乖乖地俯首听命。每个人对法国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所达到的强盛地位既感到畏惧，又羡慕不已。法兰西民族排解了她的一切纠纷，

她的力量在伟大国王的统治下联合起来，因此她成为当时的一大强国。不列颠群岛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方法达到同样的强盛地位呢？

他坚定不移地考虑着自己的宏伟计划。查理二世的暴卒，使他从容不迫地登上王位。为了把王权抓到手，他采取了可以想到的各种措施，登极开始发表的声明使惴惴不安的全国各界人士感到了宽慰。他企图在民众的心目中消除他力图报复、向往专制的印象。

1625年春天，查理一世继位，但是他是一个举止轻率，顽固执拗，自以为是而又目光短浅的人。他和他的父亲一样，相信王权是无限的，而且是神授的。刚即位不久，他同国会的矛盾就激化起来，甚至到了多次解散国会的程度。但是为了给对西班牙战争筹借军费，查理一世召开了第一届国会，看来水火势难相容，这次国会又因双方存在分歧而被再度解散，士兵要吃饭，战马要饲料，军费还是免不了的，国王于是就强行摊派。可惜英国在这一方面比不上中国，“天地君亲师”的宣传工作还很不够，国王的强行摊派因他的权威不够而失败。仗还在打，军费是免不了的，无可奈何之余，也只好重新召集国会，毫无疑问，这届国会不会是平静的，火药桶已堆满了古老的威斯敏斯特大厦，唯一欠缺的是一根火柴，抑或说是一根导火索。

国王在国会开幕式上态度傲慢、专横，并明确表示：如国会绝拒拨款，他将诉诸“上帝交给他的特殊权力”。国会则一开始就提出“权利请愿书”，这是一个限制王权的尚方宝剑，国王自然不愿自作其茧。国会一开始就充满着“火药味”，经过不懈地斗争，“权利请愿书”虽然通过了，但国会又因宗教和征税问题陷入僵局，从而导致被解散。从此，英国进入长达11年的无国会专制时期。

正当查理一世权倾一时、歌舞升平之时，苏格兰起义爆发，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国王此时又要求助国会了。1640年11月国会召开，由于资产阶级人士的大力活动，国王反对派在国会中再一次占据优势，国会围绕“大抗议书”展开了激烈辩论。“大抗议书”共206条，它揭露了查理一世暴政，并提出大臣不对国王负责，而只对国会负责的要求，这实质上是要架空国王，把国家最高权力转到国会手里，这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集团企图通过和平手段来夺取政权的一种尝试，专横的国王是绝对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的，他离开伦敦，到了北方，开始筹建军队，准备夺回失去的权力。

1642年10月，国王挑起了内战。“保卫上帝，保卫国王查理”的封建贵族、宫廷官吏、国教徒聚集在国王周围，而城市工商业者、市民以及自耕农、贫苦农民则站在国会的旗帜下，骑士党（王党）和园颅党（国会）正式形成。战争初期，国会军屡战屡败。这时候，克伦威尔走上前台，成为内战中的风云人物，他出身一个经营工商业的绅士地主家庭，29岁时当选国会议员，战争开始时是一名骑兵大尉（仅仅因为他自己招募了60人的骑兵连）。后来他组织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这支队伍充分体现了他的建军思想。首先，士兵的来源，大多数人都是“上帝军人的天然材料”——自耕农；其次，在选拔军官方面，不拘门第，唯才是举。看来天下枭雄都具有这一共同的品质，中国的曹操、法国的拿破仑皆属此类。

1644年春季和夏初，英国内战十分激烈，议会军人数已经不少（约

5万人)，但实际上还未联合起来统一指挥。议会军在各个战场上战果不一。6月底，在约克城西北约10公里的一个名叫马斯顿荒原的地方，由利文伯爵和戴维·莱斯利率领的北部军队和由曼彻斯特伯爵和克伦威尔中将指挥的“东部联盟”军队所组成的议会军，同鲁珀特亲王和纽卡斯尔公爵率领的骑士党军队遭遇。

7月2日，马斯顿荒原上发生了一场大战，这是整个内战期间参战人数最多的一次战斗。三方面的议会军共达2.7万人，其中步兵约2万人，骑兵7000人。保王党的军队总数少些，只有1.8万人，但其骑兵人数与议会军骑兵相等。凌晨，战斗序幕拉开，就是一阵猛烈的炮击。据当时一位目击者说：“炮火十分猛烈，天空似乎完全变成了火海。”但是直到傍晚双方都没有发动进攻。白天下过几阵雨，看来当天根本不会再有战斗了，然而到了晚上7点钟战斗又开始了。战斗一开始，互有进退。克伦威尔首先发起进攻，但未能一举突破敌军防线。鲁珀特进行猛烈反击，结果克伦威尔的骑兵一时乱了阵，克伦威尔本人在混战中颈部受伤，不得不暂离战场包扎伤口。正当克伦威尔及其部队处境十分危急的时候，戴维·莱斯利的后备部队从侧翼攻击鲁珀特。这就使克伦威尔腾出手来重整他的骑兵中队，然后他就全力猛攻鲁珀特的骑兵，终于将其彻底击溃。

马斯顿荒原大战是内战的转折点，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大捷中显示了卓越的统帅天才。议会军所以能取得胜利，固然是由于官兵们的坚强不屈，英勇善战，纪律严明的结果。但是克伦威尔善于在战斗环境中审时度势，从侧翼猛烈进攻敌人，也是个主要原因。现代的历史文献（如贝洛克1934年写的《克伦威尔》等等），试图贬低克伦威尔在这次战役中的功绩，把全部胜利都归功于莱斯利和苏格兰军队，这是毫无根据的。

由于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大战中取得的胜利，因而取得了“铁骑军”这一有名的称号。这是鲁珀特亲王因克伦威尔在战斗中的顽强，最初用来称呼克伦威尔一人的，但是后来这个称号也用来称呼克伦威尔的士兵，最后成了克伦威尔全军的名称。

1645年6月14日，纳西比战役拉开了序幕。王军率先发起了进攻。克伦威尔的军事天才在这里得到了再次显现。他带领一支刚经过改编的军队对抗骑士党人的主力军。当挥舞着雪亮的战刀直冲过来时，他指挥若定，毫无怯意，命令一支队伍牵制敌军主力，而自率铁骑兵冲击敌人的中军，他高举战刀，率先向敌人冲过去，经过一番激战，王军主力被彻底击溃：1000余名官兵被击毙，4500余人被俘。园颅党人缴获大炮十数门，火枪近万支……纳西比战役奠定了第一次内战的胜利基础。

丧师失地的查理一世也是穷途末路，竟被苏格兰人以巧簧之舌骗到了苏格兰，成为苏格兰人最大的战利品。国王一世为人奸滑，在各种势力间纵横捭阖，极尽玩弄权术之能事，那知此次却让射鹰人被鹰啄了眼，岂不悲哉？

这个被后来定为“叛徒、暴君、杀人犯、人民公敌”的国王的身价竟高达40万英镑，这一身价是在国会从苏格兰人手中赎回国王时所付的赎金。资产阶级对花巨额金钱赎回的国王礼仪有加，希望与他达成协议。但是享受惯专制王权的国王是不会轻易停止挣扎的，他勾结苏格兰人，

以出卖国家利益为筹码，希望苏格兰人帮助自己恢复王位。就这样，“上帝的事业”的支持者们在国内发动叛乱，苏格兰人武装干涉英国，国王阴谋复辟，种种阴谋交织在一起，第二次内战烽烟再起。大敌当前，颇有仇隙的“兄弟们”重新携起手来，共同御侮。再次团结起来的革命力量斗志昂扬，迅速镇压了王党叛军，打败了苏格兰干涉者，赢得了第二次内战的胜利。

在内战中实力空前强大的士兵和群众成了时势的主人。通过与“绅士们”的激烈斗争，结果审判委员会“以英国自由的保存者的名义，根据国会的权力”对国王判处死刑。随着查理一世人头落地，英国的封建专制制度结束了，英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历史的车轮在人民的推动下滚滚向前，赢得了第二次内战胜利的下院使出“胜者为王败为寇”的老手法，通过了取消上院的决定，而自己则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处死了国王的英国实行了共和制。1649年5月19日，英国正式宣布为共和国。

爱尔兰在历史上曾经经常遭受英国的侵略。进入斯图亚特王朝，由于英国在爱尔兰推行“专横制度”，使得爱尔兰人对英国本来就强烈的敌意进一步加剧。

1640年英国爆发的革命推动了爱尔兰的民族斗争，他们希望用武力来解除英国的统治，因为他们因武力而失去了自由。他们对殖民者狠狠地进行了报复，据说杀死了1万余人。在国会与国王的斗争中，爱尔兰支持“代表上帝”的国王，当查理一世被处死后，爱尔兰宣布他的儿子为国王即查理二世，这些都为独立派共和国远征爱尔兰提供了充分理由。很早以前英国政府就用“狼来了”的伎俩从宣传上作好了远征的充分准备。其实，即使爱尔兰安分守己，被征服的命运还是避免不了的，因为爱尔兰是块肥肉，资产阶级的先生们渴望使之成为自己的美味佳肴。

1649年7月，曾经为英国的“自由、公正”流过血出过力的士兵们，现在为了“财富、仇恨”整装待发，准备去作绿岛——爱尔兰的主人。这一场名符其实的血与火的战斗，由于英国佬的那些“上帝的军人”久经沙场，英勇善战，更有那亨丁顿的小绅士的卓越领导，乌合之众的爱尔兰军队哪是其对手，所向披靡的英军在短短的两年内就彻底征服了爱尔兰。

爱尔兰被解决后，苏格兰又重新被提上日程。处死国王后，不但苏格兰封建贵族，而且广大资产阶级都公开反对共和国，并且和逃亡在荷兰的查理二世勾结起来。后来查理二世抵达苏格兰，来自苏格兰方面的危险已经显露出来。

同爱尔兰一样，苏格兰的敌视行动只不过是征服行动的借口和外因，究其源仍是资产阶级先生们觉得自己的腰包不够鼓，希望用锋利的宝剑来换取诱人的土地和金钱。英勇善战的克伦威尔再次荣任远征军主帅，训练有素的苏格兰军队自非爱尔兰的杂牌军可比，而且统兵主帅列斯里也是个富有作战经验的名将。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曾在第一次内战中与克伦威尔并肩奋战的列斯里不是“铁骑军”领袖的对手。登巴尔一战，已占尽优势的苏格兰人结果被英军杀得丢盔卸甲，并丢掉了首府爱丁堡。第二年温斯特决战，英军表现出高超的战争艺术，一场

血战，苏格兰人全军覆灭，查理二世幸免未俘，只身逃往法国。1654年苏格兰正式与英格兰合并。

征服爱尔兰和苏格兰使得克伦威尔获得了“常胜将军”的桂冠。资产阶级的历史著作认为这是克伦威尔军事天才的胜利，但却忽略了这支革命创建的“新模范”军取得胜利的真正原因。在取得胜利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独立派同平等派的联盟，以及同民主派别的联盟。这种联盟保证了克伦威尔的军队在同保皇党及长老会反动派斗争中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革命军为正义事业而战，为革命事业而战，恰恰在这一点上才决定了斗争的结局。但克伦威尔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使自己写进了光辉的历史。这个小地主成了资产阶级先生们手中最锋利的一柄宝剑。雄才大略和崇高荣誉，使得这个清心寡欲的清教徒拥有了狂妄的心理，这为他今后的独裁专制提供了重要条件，他成了一个具有政治野心的军事家。

军人的东征西挡建立了赫赫战功，但国会的老爷们却江河日下，议员们营私舞弊，贪污贿赂蔚然成风，过去的救世主而今成了众矢之的。精明强悍的军人政治家克伦威尔顺应民意，“替天行道”，1653年4月，他带领荷枪实弹的士兵，驱逐议员，解散了名声扫地的国会，扫清了障碍之后的克伦威尔逐步走向了权力的顶峰。当年12月，这个昔日的士绅士在他53岁的时候，登上了护国主的宝座，成了大英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实行军人治国，开始了军事独裁统治。

“上帝选中的人”克伦威尔因长期的军事统帅生涯和辉煌的胜利而相信自己是执行上帝旨意的使者，相信自己所作的一切又领命于上帝，他不可避免地成了独断专行的独裁者。

护国主的文治武功为后来大英帝国取得海上殖民霸权奠定了基础。如果说克伦威尔在镇压国内各种势力方面充当了“警察”的角色，那么在维护和发展资产阶级利益方面则是个“忠诚的奴仆”。

1658年9月3日，一代枭雄克伦威尔在他军事荣誉达到顶峰的周年纪念日终于由于长期征战和疲劳过度，与世长辞了。这个大英帝国的无冕之王在英国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他是用自己的权威和武力来维护政局的。这个铁腕人物去世后，给英国政坛留下了一片真空，为一些素有野心的文臣武将提供了表演的舞台。

克伦威尔死后，由他的儿子查理·克伦威尔继承父亲的王位。但查理·克伦威尔是一个软弱无能之辈，他既没有他父亲的军事天才，又缺乏刚毅和魄力。在老克伦威尔死后6个星期，军官们就首先发难，想使军队脱离查理的控制，查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接受军方的要求。在查理失去军队这个支柱后不到半年，就被迫辞去王位的职务，查理的统治就这样结束了。

“群龙无首必乱”。尤其是经历南征北战的军事将领，平素养成专横强硬的性格，一旦主心骨一断，动乱就将发生。起先是军队副总司令解除拥兵自重的兰伯特将军职务，继而是兰伯特将军发动政变，英国陷入了空前的政治混乱。亲眼看到平民派起义声势的资产阶级先生们再也不敢调动人民来革命，转而求助于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来保住自己鼓鼓囊囊的腰包，要作到这一点必须以政局的相对稳定为前提，他们把求助之手伸向了驻苏格兰军队统帅蒙克将军。这个昔日的骑兵排长现在成了

英国的希望。他没有使绅士们失望，在短期内就用武力恢复了社会秩序。1680年5月29日，查理二世在他而立之年的生日那天重新登上了英国的王位。

当查理还在法国时，为了顺利重登宝座，应资产阶级要求在布列塔发表宣言，宣称：大赦一切革命的参加者，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对革命期间产生的土地财产关系保持不变，补发军队军饷。查理的诺言获得了资产阶级的支持，因此赢得了王位。

聪明的查理二世不像其父亲那样鲁莽，他回国之初恪守诺言。当时，国王的土地全部被拍卖，在经济上要依靠别人，寄人篱下，自觉低头。而且，他没有常备军，爪也不够锋利，静以观阵是查理二世的明智之处。

有仇不报非君子，这一点并非中国人的发明，是人类的本性，查理二世也不例外，杀父之仇，流亡之恨，他无时不记在心头。当他羽毛丰满了时，这个流亡者将诺言忘得一干二净，高举复仇的利剑，开始了复仇行动。首先就是严惩乱民，对审判老查理的人以“弑君罪”来处理，那些曾在法庭上历数国王暴政，理直气壮地宣布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人们遭了殃，大量的革命者及其支持者死于复仇之神的剑下。在活着的时候蹬一蹬英伦三岛都要抖几抖的克伦威尔，天国享福后也没有逃脱无所不在的复仇之神，他的尸体被挖出来，处以绞刑，脑袋被吊在广场上示众。克伦威尔可能作梦也没想到，他也会遇到这种充满仇恨的国王。

查理为了复仇而表现出的耐心和采取的手腕实在令人惊叹折服。他容忍跟他有仇的阿伦德尔和格洛斯特在官场混迹八年，他们二人不像以前那样担任郡守，而是仍然身居高位。不过，查理也有感情迸发的时刻。1664年，阿伦德尔参加王后安妮的葬礼时姗姗来迟，耽误了整个仪式的进行，查理夺过一个侍从的礼杖，朝他的脸上打去，打得鲜血直流。在场的教士惊呼道，“威斯敏斯特的教堂被玷污了。”人们又想起了旧时的预言：由于贝克特遇害，上帝将惩罚全国，一直到血染圣殿为止。可是过了几个星期，国王似乎又同阿伦德尔和解了，再度把一切矛盾巧妙地掩盖起来。当他后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就报仇雪恨了。在乌云密布的日子里，大量英国人为了避免迫害逃往欧洲大陆，专制王权在查理二世的铁腕统治中得到了日益的加强。

作为专制主义国王，查理二世从未放弃恢复专制制度的宏伟目标，尽管在回国之初不敢公然强调无限制王权。“成大事者，雄才大略为其脑，财政经济为其根”。要达到目的，他将希望寄托在法国专制君主路易十四的援助上，这样既可摆脱国会限制，又可建立自己的常备军。为了钓法国这条大鱼，他不惜血本，大抛诱饵。1662年，查理二世将克伦威尔浴血奋战从西班牙手中夺来的敦刻尔克卖给法国，仅索价20万英镑。这件事干得很缺手腕，敦刻尔克是英国商人在大陆贸易的根据地，失去它，对英国商业有其严重的影响，况且法国在英国资产阶级眼里乃是自己最具威胁性的敌人，这使英国的绅士们极其愤怒。

17世纪60年代的法国商人及殖民者与英国商人及殖民者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而荷兰的实力则每况愈下，不足为患了。因此，英国资产阶级要求联荷反法，查理二世迫于国会的压力订立了英、荷、瑞三国同盟。奸诈的查理二世没有国会想象中那么驯服，1670年他与法国宫廷签订了都佛密约，密约规定：查理二世有“义务”在英国恢复天主教和与法国

共同对荷兰作战。而路易十四有“义务”派军队帮助英国镇压“骚乱”。都佛密约背叛了英国国家利益，由于这项条约，英国政府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变成了法国手里的侵略工具，让法国人当枪使。十七世纪60年代末，法国政府对输入法国的外国产品实行高关税政策，这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英国的商品输出，法国人在西印度群岛的积极活动也侵害了英国商人的利益。斯图亚特王朝为了自己的利益及宫廷大贵族的利益，而把英国的全部工商业利益出卖给法国政府，而法国当时正是与英国人竞争并且在许多地方取得胜利的唯一的危险敌人。

1672年，“一诺千金”的查理二世果然参加了对荷战争，英国舰队袭击了荷兰商船队，可惜它抖不起克伦威尔时代的雄风，被荷兰人屡次击败。查理二世一丝不苟地执行都佛密约，他颁布“容忍宣言”，迈出了恢复天主教的第一步。这样作不仅伤害了英国人民的宗教感情，更重要的是触犯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恢复天主教将使新贵族失去从寺院得来的土地。

专制独裁的查理二世的行为引起了资产阶级的猛烈反击，“容忍宣言”被迫流产，国会还就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提出了“宣誓法案”，使信仰天主教的大贵族丢了乌纱帽。接着国会又通过法案，无条件地禁止法国工农产品输入英国，声势浩大的国会反对派，对专制统治王朝来说，实在是太可怕了，查理二世行使了上帝赋予他的权力，解散了议会。

1685年，查理二世死了，天主教徒约克公爵荣登王位，是为詹姆士二世。他上台后推行带有刺激性的政策。他签署了第一项《免罪令》。这项法令的内容正是国会早就表示反对的，它以王权取代了国会的法案。同时，詹姆士一意孤行地派一名天主教徒去担任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的院长，并且驱逐了进行抵制的评议会会员，因此引起了更强烈的反应。七月份，詹姆士计划公开欢迎教皇使节德阿达。

詹姆士制定了他的政纲，第二步便是建立政党作为自己的工具，第三步是通过他的党羽组织一届有权废除《宣誓条例》的国会。他的这一切行为，尤其他恢复天主教一事，作得太愚蠢了。

众所周知，恢复天主教必将遭到全国大部分居民的反对；新贵族自不必说，他们中有很多人收买过贱价的寺院土地，天主教的恢复会带来反攻倒算，土地必然丧失；国教僧侣担心天主教的恢复会影响国教的统治地位，分去一杯羹；一些大贵族曾获得大量国王赠送的教会土地，他们害怕同新贵族一样会得到失地的命运，天主教完全不适合工商业活动，这使资产阶级也有很深的顾虑，特别是法国的“南特教会”使英国广大新教徒感到天主教的胜利将是他们的灾难。鲁莽、刚愎的詹姆士二世一下子给自己树立了这么多对手，这虽能显示他的勇气，但更能摧毁他的世界。

英国广大居民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反对恢复天主教的运动。本来，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还不想推翻詹姆士二世的，他们企图利用国王无子嗣而立开明的威廉——国王的驸马作英王继承人。但1688年詹姆士能干的妻子生了一个王子，就是这个宝贝的王子导致了詹姆士的结局。反天主教的领袖们向威廉发出邀请书，请求他干涉恢复天主教的事，威廉是荷兰执政兼英王驸马，本来他是希望依靠妻子的继承权来得到英国王位的，但王子的出世打破了他的蓝图，因此他非常乐意武装干涉英国。11月1

日，威廉打着“保护英国的新教、自由、财产和自由的国会”的旗号，率精兵 1.5 万人扬帆渡海，直取英伦三岛。一登上英格兰的土地，英军将领就纷纷“弃暗投明”，转到威廉方面来，就连国王军总司令约翰·丘吉尔也投到了威廉的麾下。而今众叛亲离，詹姆士二世许下种种诺言，企图扭转败局，但逝者长已矣，一切都来不及了。

詹姆士发现他已经无力组织抵抗，便召集仍在伦敦的上院议员和枢密院成员开会。根据这些人的建议，他开始同奥朗日亲王威廉谈判，可是威廉的远征军继续向伦敦挺进。詹姆士将王后和王子送往国外，自己于 12 月 11 日深夜溜出王宫，渡过泰晤士河。他所作的一番努力把英格兰王国推入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詹姆士已经逃到一只船上，可是没有赶上海潮，被渔民和达特默思的市民抓住拖到岸上，押回伦敦。过了一段时间他再次逃跑。这一次他得以逃离虎穴，离开了英格兰，从此一去不返。这位行动失策的国王在垮台和逃亡之时有所失大雅，然而史书却为他恢复了尊严。他为宗教作出的牺牲使自己赢得了天主教会的长期尊敬。在终身流亡中，他一直保持着君主的尊严和气节。

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威廉并没有如想象中一样轻易登上英国王位。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争论不休。颇有涵养的威廉没有太忘情，他终于忍耐不住了，以返回荷兰相威胁。强权是最有力的武器，他的恫吓立竿见影：国会宣布威廉和玛丽为英国的国王及女王，共同统治英国。实际上一切权力都握在铁腕女婿的手中。

1689 年，英国国会为威廉和玛丽举行了隆重的加冕典礼，当镶满钻石的豪华的王冠由大主教戴在威廉的头上后，这个大英帝国的新国王腾地站起身，高举着权杖，接受千万臣民的欢呼，那坚毅刚强的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从此，英帝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将国王宝座拱手让给了威廉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并没有作蚀本生意。就在加冕典礼后不久，国会根据“权利宣言”的精神颁布了具有不可估量影响的《权利法案》。法案规定：此后英国国王必须是国教徒，它也限制了国王的权限，保障了国会的权威。它取消了国王“搁置”法律的权利，规定国王没有权力使法律无效，或者不得国会同意而执行它，国王不经国会同意便无权征税、招募及维持常备军。它规定了国会的权利，国会选举必须自由，国会议员有言论自由，国会应该经常集会。《权利法案》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正式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的新型国家。接着，为了补充《权利法案》又颁布了《容忍法案》，允许非天主教的国教以外，教徒有宗教信仰自由，但这种自由有一个条件，即他们必须接受国教教会的信条。这样就扩大了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有利于社会的安宁和国家的稳定。

从 1642 年开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几经波折，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反反复复，直到 1689 年方告成功。《权利法案》的颁布，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对英国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法案颁布后，专制制度在英国彻底绝迹，君主立宪制确立起来了。不消说，这是因为 40 多年的革命已给予专制制度以致命打击，并建立了共和国，专制王权再也回天乏术，国会开始彻底支配国王，立宪君主制的确立意味着资产阶级和新

贵族取得了政权。通过国会，这个先进的阶级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来指挥政府的活动，以利于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首先是加紧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推行手工业工场的繁荣，这些政策使英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巨人；其次就是调整外交政策，有害于英国的亲法政策一去不复返，英国的政府参加了反法同盟，开始了对法国的长期的商业战争。同法国争夺的结果，使大英帝国的战舰无所不在，高高飘扬的米字大旗插上了每一个重要地区，日不落大帝国成了英国的“雅号”。数百年来，英国一直作为世界盟主的地位出尽了风头。

法国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

1661年9月，法国宫廷权力斗争的消息很快自南特传遍法兰西全境。一向受法王路易十四宠爱的法国财政大臣、不列塔厄高等法院的议长福格被国王逮捕。朝野上下一时议论纷纷，大家都觉得巨大变革的时代似乎就要来临了。

长期以来，法国人心目中固有的印象：福格的无与伦比的权力，法国统治实权旁置的传统，路易十四的无能，被这个事件强烈地扭转了。

1638年，路易十四出生，5岁时便登基成为国王。此时，政权掌握在他的母后安妮和红衣枢密主教马萨林手里。政权由谋臣执掌，国王只主持宫内生活，似乎是当时法国的惯例。亨利四世，即路易十四的祖父在位时，权力属于谋臣宰相沙列；路易十四的父亲路易十三在位时，利希留执掌大权。但路易十四有个伟大的设想，他要冲破这个惯例，独掌大权，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政治，重建法国的权威。

但这种雄心大略，在他青少年时代尚未暴露出来，相反，人们心目中的法王路易十四是位胸无大志、沉迷酒色的昏君，他的贪图享乐强化了人们的此种印象。他沉湎于酒色之中，对于看戏、宴舞、狩猎等有着特殊的兴趣。每个星期天，路易十四便在皇宫里举办盛大舞会，邀请各方有名之士参加，他在众人陪伴下款款起舞，他优美的舞姿常常博得众人一致的掌声。当时，贵族里许多有姿色的女子都成了路易十四的情妇。他面容中庸，无甚特色，更使许多人看他不起。但在路易十四的内心里，他认为自己生而为王，担负着巨大的历史使命。

当时法国的中央政权面临严峻的挑战，国力日见不强。诸侯们大部拥有重兵，各占一方，他们的许多宫林，比法国王宫还俊秀，其财富也不在路易十四之下。仗着强大的实力，他们根本不把路易十四放在眼里，王室的威望日见其低。1618~1653年，贵族和高等法院相勾结，对王权发起攻击，调集了大批军队进攻王宫。奥尔良大公指挥的军队居高临下，在巴士底狱向国王的皇宫卫队开炮，处于劣势的皇宫卫队损失惨重，无力守卫。路易十四被迫随安妮和马萨林逃离巴黎，从别处借兵，反攻巴黎。经过努力，叛军失败，路易十四重又回到了巴黎，但这次乱军显示出了法国的王权处于飘摇之中。

1661年，马萨林去世了，权力无可争议地落在了福格手上。福格是当时的著名贵族，任财政大臣，他手上有庞大的私人军队，全由荷兰雇佣兵组成，作战勇猛。一支精干的私人舰队也在他的控制之下，包括6艘战舰，35条武装小艇，这足以抵得上一个一般的小邦的海军实力。在他的封地里，他狂征滥敛，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修建了庞大的宫室，足与王宫媲美。更为重要的是，他善于结交，同其他许多贵族关系密切，国家的一切重要部门，甚至在王宫里也有他的耳目。在政治上，他除了担任财政大臣，还任巴黎高等法院大法官，而巴黎高等法院一向是与王权相对立的一座堡垒。因此，不能不说，王室的安全面临着福格严重的威胁。

但这时候路易十四已渐渐显出其魄力。据说，在马萨林去世后，为他超度的红衣主教卢昂偷偷问路易十四：“您尊贵的助手踏上了天国的旅程，请问：政权以后谁来料理呢？”路易十四不加思索：“我自己料

理。”卢昂当即一怔，没有再问。其后权力虽落在了福格手里，但路易十四已开始为夺权作准备。

聪明能干的福格感觉到了这一点，他费尽心机，以便转移路易十四对王权的兴趣，企图使他依旧沉醉于灯红酒绿的享乐世界，玩物丧志，以确保国家的统治权掌握在福格自己的手中，而不是法王的手中。而正巧当时路易十四对新情妇拉瓦叶夫人十分钟爱，福格便把自己的一座精巧的别墅让给路易十四，并在里面整夜整夜地为他和拉瓦叶夫人举行露天宴会，以转移路易十四对王权的兴趣。后来似乎收到了效果，路易十四也不过问政事了。福格以为自己得到了路易十四充分的信任，便得意起来。

殊料路易十四采用的是缓兵之计，欲擒故纵。1661年9月，福格到南特担任议长。紧接着，捷报向路易十四传来，近卫队队长连尔他涅恩已将福格逮捕。

从此，法国军政大权集于路易十四一身，该是他施展神威的时候了。当时，23岁的路易十四声势威严地道出了他的垂世名言：“朕即国家。”法兰西是我的天下，我想干什么，便可以干什么。

牢牢控制了法兰西立法、司法及行政大权的路易十四，他把法王的权力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路易十四当政（1661 - 1715年）是法国专制制度的鼎盛时期。野心勃勃的路易十四掌握实权之后，便加紧推行他的开扩疆土的宏伟计划——著名的“天然疆界计划”。他认为，法兰西的疆界，应由天然物组成：

- 西南是连绵起伏的比利牛斯山；
- 南疆是蔚蓝色的地中海；
- 东南部以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为界；
- 自南向北缓缓流动的莱茵河为东界；
- 北海则成为北部的屏障。

为了实施扩张计划，路易十四侧重完善了法兰西的军事官僚机器，中央掌握了调动全国各地军队的绝对权力，可以保证对外侵略时，全国军队一盘棋，步调一致，改变雇佣外国人服役的传统，招募本国青壮年参军。这个新办法可以把人民群众中的武勇强悍的分子吸收到军队中来，一举三得：既削弱了人民反抗王朝的力量，又加强了镇压人民的力量，同时也为侵略扩张提供了可靠的兵源。

首先，在收复敦刻尔克的战斗中，路易十四显示了他的扩张野心和军事天才。敦刻尔克本是法国领土，但在克伦威尔时代，它被英国割去了。路易十四率领不多的军队从山上冲下来，几乎把英军杀得全军覆灭。敦刻尔克重又回到了法王手中。

敦刻尔克收复之役揭开了法王路易十四推行其“天然疆界计划”。

当时国际局势，主要是欧洲局势对法国十分有利。通过30年战争和西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德意志和西班牙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哈布斯堡王朝也趋于破落不堪，短时间内在国际舞台上很难发挥大的作用，而他们都曾是法国的宿敌，是法国以前一直想削弱的。另一个强国是英国，但当时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了，国内人心惶惶，无精力干涉欧陆政治，查理二世梦图恢复专制王朝，因为财政问题经常同议会争吵。无奈，便向法国伸出了乞讨之手，靠路易十四的补助维持其豪华的宫廷开支。可以看

出，法国当时在欧洲没有一个强敌。

路易十四首先向北发展，他以 1667 年发起了遗产继承战争。1665 年，西班牙国王腓力普四世去世，路易十四为了达到天然疆界的目的，仗着国大力强，要求继承西班牙属地尼德兰，结果自然遭到断然拒绝。路易十四大怒，亲率大军首扑尼德兰，对西班牙的战争自此揭开了序幕。

战争的第一阶段，法国战果是辉煌的。因为西班牙势单力薄，国力尚没有完全从 30 年战争的消耗中恢复过来，同时又没有盟军的支持；虽则在比利牛斯山一带开辟了第二战场，但路易十四早在这里屯有重兵，使西班牙引火烧身。在 1667 年上半年里，法军似乎没有受到什么抵抗，便占领了重要城市法兰斯孔太，西班牙本土也处于岌岌可危之中。

可是局势此时有了变化，西班牙有了盟军，即荷兰、英国、瑞典的联盟。

在 1667 年结束的第二次英荷战争中，由于法国和英国的殖民扩张政策有矛盾，路易十四便支援了荷兰的对英作战，使荷兰少受损失。路易十四本以为这一次荷兰会感恩涕零、不会影响自己的天然疆界政策了，其实不然。任何国家，当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甚至有可能为他国所占领时，都会起而应战的。荷兰便处在了这样的关头，因为按照路易十四的计划，荷兰同样是处于法国天然疆界之内的，这令荷兰人感到不安。而当他们看到自己的近邻尼德兰成为法国冲击的目标时，当他们看到法国的强大时，便看到了现实威胁：法国人会不会在占领尼德兰之后向自己进攻呢？！当他们把这个疑问确凿后，也就定下了自己的计划，必须帮助尼德兰、西班牙打败法国，从而也使自己免受法国打击。但眼看法军步步紧逼，再算计自己的实力，怎么也不可能是法国的对手，怎么办？

战略家的估计往往是和实际相符的，荷兰的领袖不愧为战略家，他估计到了联合英国、瑞典抗击法国前景的光明，便向英、瑞提出了建议。英国为第一海上强国，它不希望欧陆哪个国家过分强大。法国扩张的嚣张之势早已令它咬牙切齿，欲置其死地而后快。瑞典作为北欧的强国，也不希望法国横扫欧洲。三个国家一拍即合，大军出动，参加了对法战争，三个强手站在了路易十四对立面，路易十四虽毫无畏惧，但战争势必拖下去。

果断的路易十四认为，自己的军事行动已经达到了预期目的，对尼德兰的吞并决不是一时一刻完成的。于是，他断然向西班牙媾和，西班牙慌忙同意。其他的盟国态度本不坚决，看到了法国的意见，也就作了顺水人情。于是，亚琛和约签订了，法国保留了弗兰德斯边境设防城市 11 处。路易十四初步显示了实力。

1660 年至 1683 年，路易十四在麦茨、都奈等地成立“属地收复裁决院”，责成法学家调查和决定过去哪些地方属于历次条约中已割交法国的城市或地区；在“收复”的借口下，路易十四派军队占领了卢森堡、斯特拉斯堡等城市。

路易十四很会记仇，他对荷兰的背恩弃义始终耿耿于怀，准备给荷兰以打击。然而，对荷作战最重要的原因其实不在此，而在于法国的利益。当时荷兰作为欧洲最强盛的商业国家，其货船奔赴在各大航线上，荷兰的货物远销各国，这给它带来了难以计数的财富。法国在各个领域都面临着荷兰商业广泛而激烈的冲击，使其在国际市场上很难立足。法

国的贵族们为此一再抱怨，要求路易十四帮助开拓市场，减少荷兰的竞争，给本国增加财富。路易十四为了法国贵族的利益，准备削弱荷兰的竞争力，他便把目光盯在了对荷用武上。

还有一个原因促使路易十四挑起对荷战争，这便是荷兰人先前所惧怕的、并且之所以得罪路易十四的天然疆界计划。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北海与莱茵河的接头在荷兰版图之中；而且，勤劳勇敢的荷兰人民历来坚持填海造陆，使陆地面积增长不小。路易十四天然疆界的巨仗终于打到了荷兰头上。

路易十四吸取了以前独自作战而孤立无援的教训，去拉英国作盟友；英国竟同意了。因为它也痛感到荷兰商业竞争和殖民地竞争的巨大压力。

1672年，战争爆发了。这一次荷兰终于感到了自己实力太弱和凄凉无助，法军声势浩大，战线推进很快；荷兰的国土一天天缩小，兵力一天天减少，法军已越来越逼近北海了。

此时，荷兰急中生智，看到了自己近海的优势，想起了自己在拦海造陆中积累的经验，便把它用在对策作战上。

是年夏天，正当法军沿一条拦海大坝全力推进时，一声巨响，惊天动地，硝烟散去后，法军发现拦海大坝炸开了个大口子，汹涌的海水铺天盖地而来。原来荷兰人开始决堤灌法军了，从未见过这种场面的法军惊慌失措，扭头便跑，但人的两条腿哪里赛得过海水的无数条腿呢？结果，大部分法军在与海水搏斗中死于非命。此次放水更重要的后果是：在法军占领地和荷兰高地之间形成一片汪洋，法军再也无法前进了。荷兰人获得了一种克敌制胜的方法，它们借此与法军周旋，这场战争又拖延了6年。

当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公开支持荷兰时，这场战争的结束也就指日可待了。在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中大受损失的德意志和西班牙，此时已缓回了劲，抬头看看变化如此之大的世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宿敌法国的耀武扬威，它们便迅速支援了荷兰，参加了抵抗法国的战争。

结局又同尼德兰争夺战相仿，具有洞察力的路易十四，深感到自己要实现全部目的已是不可能，而且战局的拖延极为不利，便装出一付和平使者的面孔，于1678年主动出面要求讲和。法国又签订了奈梅根和约。此时法国又争得了一个胜利：比利时的康布雷、瓦朗西两个据点归法王所有。另外，在尼德兰争夺战中，法王曾经占领后又退出的法兰斯孔太，在奈梅根和约中也正式归在了路易十四的名下。

从亚琛和约到奈梅根和约，以及路易十四即位执掌以来法国的种种举动，使西欧各国看出了路易十四循序渐进争夺国土的野心。这激起了他们共同的怒火和强烈不满。但是，法军在战斗中已发展壮大，它的人数等于所有西欧国家军队人数的总和，且装备先进，战斗经验丰富，战斗力强。于是，西欧各君主又对路易十四怀着深深的畏惧感。路易十四表面上十分文静，但从行动上又不难看出他的野心。1681年，他用武力占领了斯特拉斯堡。1684年，路易十四又攫取了卢森堡和另外几个德意志城市。从此，所有欧洲国家都感觉到了来自法国的切实的威胁。但是，慑于路易十四强大的武力，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敢于带头组织反法同盟。然而，从路易十四扩张引起的发展趋势看，反法同盟的建立已是或早或

晚的问题了。

早晚必成的反法大同盟终于在 1688 年正式形成了，它的领袖竟是与法国和而又分、又和又分的大英帝国。

从 17 世纪末叶起，英法矛盾成为欧洲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荷兰倾向于同英国结盟，两国联合对抗法兰西的侵略扩张。

1688 年，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新兴贵族再也忍耐不了詹姆士二世的专权了，他们在谋求更加鲜明的资产阶级专政。然而，由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前几次的复辟中背叛了人民，支持了复辟的君主，他们如今再也激不起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了。因此，他们的目光瞄向了“圣明的君主和圣明的女王”，即荷兰执政的威廉和詹姆士二世的女儿、信仰新教的玛丽。是年 6 月，威廉率军登陆英格兰，英国国内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同时逼走了詹姆士二世，一场政变很快胜利了，威廉当上了英国国王。

詹姆士二世的出逃使英国亲法派势力大减，而一向与法国有隙的荷兰，他的君主成了英国国王，英法之间必然由友好关系转为仇恨关系了。历来的历史学家大都这样的解释，并把这作为英国带兵组织反法大同盟的唯一原因；实际上，这是对历史的粗暴干涉！英法的对立是由于它们之间的利益发生了根本的冲突。因为到 17 世纪下半期，在英法打击下，荷兰已逐步走向衰落，大量的殖民地和金银财富落在了英法手里。其中英国建了许多殖民公司，在北美，在远东、太平洋、非洲都有它的许多殖民地。法国的首相科尔伯特为路易十四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到 1680 年，军舰已达 120 多艘，它们进出加拿大、西印度群岛、马达加斯加、印度等地，扩展了法国海外的领土。于是，英法殖民者开始在海外冲突，殖民地的得失往往在英法间几次易手。这些冲突最终反映在朝廷上，反映在英法两国的对外政策上，构成了它们之间的尖锐的对立。

1672—1675 年战争之后，荷兰联合奥地利和布兰登堡于 1686 年组成反对法国的奥格斯堡联盟，参加的国家还有西班牙、萨伏依、瑞典、巴伐利亚、萨克森等。

1688 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也参加了对抗法国的战争，自然站在奥格斯堡同盟方面，并且是对抗法国的关键性力量，在反法同盟中居于主要角色。

奥格斯堡同盟战争是 1688 年因法国吞并巴拉丁纳特引起的。巴拉丁纳特系德意志的一个邦，它的邦主查理和法王路易十四有亲戚关系，查理的妹夫便是奥尔良公爵，奥尔良公爵则是法王路易十四的胞弟。1685 年查理去世，却无法定继承人，路易十四便以其妹妹的名义要求占领巴拉丁纳特的大部分地区，巴拉丁纳特便慌忙向其他邦求援。援军虽至，无奈法军攻势太狂，不久巴拉丁纳特便丧失了。然而，德意志皇帝看出了英法间的矛盾，便向英求援，这正好成了英国在陆上与海上打击法国的借口。1688 年冬，庞大的反法同盟在英国领导下建立起来，其中包括法国的宿敌德意志、西班牙，法国曾数次进攻的荷兰、勃兰登堡，它们把对法国的惧怕发泄在集体的进攻之中，欲给法国以致命性打击，使路易十四再也不能称霸欧洲，好使自己高枕无忧。

然而，在路易十四的统帅下，法军强大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在陆上的势力已达到了预期中的天然疆界，而且数次把英国军队赶出欧陆。但是，法国的海军却抵挡不住英国皇家舰队和爱尔兰海军的夹击，

舰只越来越少，海上殖民地不断丧失，且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与此同时，反法大同盟也已有气无力，精疲力竭。1697年，战争的双方在立兹威克签定了一个和约，算是打了个平手。

现在，路易十四已经与欧洲的许多国家处于对立状况了。

到18世纪初，在反法大同盟的打击下，一向称雄欧洲的路易十四开始走下坡路了。

1700年11月，又一个短命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去世。法国在额庆之余，眼光却瞄准了西班牙丰富的财产。这时的西班牙虽已失去了其海上霸主地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在强盛时掠夺的财富仍然堆积如山，充实在国库里；它的殖民地依旧遍布五大洲，如在意大利、尼德兰、美洲的领地、亚洲的菲律宾等。这些地区也逐渐成了西班牙经济发展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大批的利润从那里滚滚流向西班牙本土。

路易十四开始行动了。恰巧，查理二世无嗣，他死后西班牙王位悬空。于是，法国向其他国家发出了照会，要求他的孙子菲力浦成为西班牙国王。欧洲各国纷纷抵制，而其中跳得最高的是奥地利，因为查理二世和奥地利统治者同属哈布斯堡王朝，按照惯例，西班牙王位应由哈布斯堡王族的人继承，因此奥地利皇帝反应最强烈。两把烈柴相撞了，一下子便剧烈燃烧起来。首先是路易十四，举大兵扑向奥地利，奥地利被迫应战，又一场欧洲大战揭开了序幕。

战争形势无疑对法国有利，路易十四强大的军队足以几次毁灭奥地利。因此，法军推进迅速，但局势又有了变化，英国、荷兰相继投入了对法战争。他们看得很清楚，如不干涉，法军会很快取胜，则西班牙丰富的财富将归于法国，路易十四会因此实力大增，从而在世界霸权的争夺战中多一个砝码，使英、荷处于劣势。同时，英国、荷兰也想在对法作战上从西班牙的财产中捞到好处。这样，战局进一步扩大了，与法国对立的力量日增，而法国在先前的历次战争中结下了许多敌人，这必然使战场继续扩大。首先，神圣罗马帝国对法国进行打击，以夺回莱茵河左岸被法国占领的土地；法国的宿敌德意志也参战了，它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只是欲在战场上报法国对它的几箭之仇。

还有一支新兴力量登上了对法战争的舞台，它便是北欧的强国丹麦、瑞典。他们似乎预见到了战争的重大意义，预见到这将是一场决定欧洲18世纪基本格局和瓦解西班牙的战争。

于是，反法大同盟包括了大英帝国、荷兰、奥地利、德意志联邦、神圣罗马帝国、丹麦、瑞典和其他一些小邦，他们在海上、在陆上同法军进行了战斗，投入人数之多，战斗之惨烈，都是史无前例的。路易十四在战争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在好几次著名的大战中打败了联军。然而联军的经济、军事潜力之和大大超过了法国。随着战期的无限延长，法国开始处于劣势。而这个时期到来时，1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此时，联盟内部也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因为它本身便不是稳固的，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和打算。首先是荷兰出现了继续作战的犹豫。因为它看到英国的海上势力不断增长，海上殖民不断扩大，而因商业摩擦与英国发生的三次战争依旧历历在目，不由不感到心灰意冷。因此它甘愿能有个强大的法国来对抗英帝国。

这时的法国，所受打击已是日趋严重，若反法大同盟能全力作战，坚持团结，法国的溃败已不太久远了。然而，这场战争的源起是西班牙继承权之争，若同盟取胜，同盟中的奥地利将无可辩驳地成为新的西班牙统治者，也就是说哈布斯堡王朝将进一步扩大，以致有可能重建它昔日在欧洲的霸权。这是其他同盟国家所不愿看到的。表现在军事行动上，这些国家便进展迟缓，与法国若和若离。

反法大同盟的首领英国的态度也有了变化：一方面它已在海外捞取了大量殖民地和财富，不愿再作牺牲；另一方面，国内政治格局有变，托利党上了台。它一向主张英法友善，反对战争，以鸽派面目出现于英国政坛。因此，英国国内和平呼声日渐高涨。

丹麦、瑞典的退出最终使反法同盟归于结束。因为自 1700 年开始，与西班牙的继承战同时，北方大战也爆发了。俄国疯狂向瑞典进攻，以求得出海口。1710 年左右，战争出现白热化，一批又一批的俄军和瑞军在战场上倒下，瑞典深感到两线作战力不从心，便和丹麦一起从抗法北线撤出了全部军队，调至北方大战战场，也就是说，丹麦、瑞典在事实上已退出了反法大同盟。

和平已走在近途上了，另一个因素成了和平的催化剂，即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力浦在历次战斗后已登上了西班牙王位，世称菲力浦一世。他是个贤明的国王，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政策，得到了广大西班牙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到 1710 年左右，菲力浦一世已在西班牙站稳脚跟，再把他赶下台，已是十分渺茫的事了。以上因素使议和开始了，首先是英国秘密同法国妥协，准备退出战争。荷兰、德意志各邦感觉出这一点后立刻公开与法妥协。经过紧张的谈判，协议达成。1713 年 10 月《乌得勒本和约》签订，反法大同盟归于不存，路易十四的光辉历史便也告一段落。

在和约里，法国的路易十四保住了自己在西欧的第一陆上强国君主的地位；但人们看出，对于法国来说，这已是日迫西山。一方面路易十四渐渐老迈了，另一方面法国丢失了大量的海外殖民地，国库也日见窘迫。

路易十四的专制王权可以说达到了法兰西历史的顶峰。这是时代的产物，因为那个年代，法国常年对外征战，人民疲倦不堪，因此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出现，使国家从困顿中崛起，使生灵免于涂炭。这种精神状态促使路易十四王朝达到了盛期。

在日常生活中，路易十四聪慧和机敏。他说话平和，但言语中常有暗刀，令人不寒而栗。

据说，有一次，一个十分老朽的官吏喋喋不休地向路易十四陈述毫无意义的问题。路易十四十分厌烦，但他没有厉声制止，只是把手杖扔到了窗外，说：“它已经完成使命了。因为它太老且弱，我再也不用它了。”吓得老官吏诚惶诚恐，再也不敢有如上劣迹了。

还有一次，路易十四在教室里听神父布道。他一向不满于阻止他行使王权的教会，当他又听到那冗长而无用的训问时，便用以下的话使神甫迅速停下来：“我十分赞赏您的布道，它是来自上帝和天国的使者；然而，希望下一次我不是被强迫着来到这里。”

路易十四反对首相的专权，反对高等法官对王权的干涉。这并不等

于他不信任手下人，相反，他礼贤下士，网罗了一大批有识之士为其效劳，代表人物便是首席顾问科尔伯特。科尔伯特才华出众，理政才能不逊于米希留、马萨林。他整顿了所有的行政机构，改革法律，调整税制体系，使之服从于法国经济的发展。他推崇重商主义，在他鼓励下，大批的手工工场建立起来，大机器工业开始建立，这为法国商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有力竞争提供了条件。

同其他欧洲君主显著不同的是，路易十四不把国王看作一种地位和荣誉的象征，而看作一种职业。关于这一方面，他的垂世名言：“执政者因为工作，也为了工作。”也使他和其他碌碌无为的国王划清了界限，这也是他的专制统治能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路易十四也喜欢享乐，不仅在其执政前期，在其执政后期同样如此。但同是享乐，他却有鲜明的政治目的，通过大量的宫廷舞会、宴会，设置大批官官，拴住众贵族的手脚，以利于自己更好的统治。同时，在客观上，一大批社会名流和艺术家、文学家，经常出入宫廷场合，对他们的创作起了积极的影响。莫里哀便是把法国的上层社会作为自己创作的源泉。

路易十四在历史上不过一闪即逝，但他执政时期，法国军事、政治、文化和外交及社会风尚的全面发展所构成的辉煌，却永远自豪地留在了法国历史中。有人是这样评介这个时代的：

“法国王朝的威信，即使在敌人的眼光里，也不会由于路易十四的好功喜战而失去光辉。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反对法国的专制王权，但法国的文学受到了一般人的欣赏，法国的书籍颇受人们重视……当时文学界，凡是想一展所长者，无不以法国为之典范，其影响之远，远达俄国东部及大西洋沿岸。”

